

思想巨子, 学人楷模

——凯恩斯和哈耶克评述

○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哈耶克和凯恩斯是两位世界级著名的经济学家, 他们的经济理论和学术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实践, 乃至社会科学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二人私人关系不错, 但学术观点不同, 有过数十年的论战, 真可谓亦敌亦友, 二人争论的焦点是货币和周期理论及其渊源和变迁, 他们有不同的思想理念和社会哲学立场, 在理论方法等各方面均有表现。我们不仅可以从二人和而不同的理论道路中得到为学的启迪, 而且可以从他们相互交往的关系中得到做人的借鉴。

〔关键词〕凯恩斯; 哈耶克; 货币理论; 经济周期; 和而不同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06.020

哈耶克和凯恩斯是两位世界级著名的经济学家, 他们的经济理论和学术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实践, 乃至社会科学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二人私人关系不错, 但学术观点不同, 有过数十年的论战, 真可谓亦敌亦友。因此, 对他们的理论贡献、理论分歧和理论论战进行一番梳理和评述,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生平简介

(一)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

1883年6月5日, 凯恩斯生于英国剑桥的一个贵族和知识分子家庭, 其父是剑桥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 其母是剑桥第一任女市长。凯恩斯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14岁以奖学金入伊顿公学, 主修数学; 毕业后以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国

作者简介: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王学院, 1905 年获文学硕士; 后师从马歇尔和庇古学习经济学。凯恩斯的兴趣相当广泛, 其活动也涉及多个方面。他不仅是剑桥大学的著名教授, 而且当过大学的司库和学监, 他不仅是政府官员和顾问, 而且是著名的投资人。1929 年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 1942 年封为勋爵, 1946 年剑桥大学授予他科学博士学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 凯恩斯应征入英国财政部, 主管外汇管制、美国贷款等涉外财务。1919 年, 他作为财政部首席代表参加巴黎和会, 因不满《凡尔赛和约》对战败国人民课以沉重的赔款, 不仅愤然辞去代表职务, 而且很快出版了《和平的经济后果》^[1], 揭露和谴责协约国领导人的贪婪和复仇心理及其强烈的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 认为和谈与和平无关, 战胜国索赔旨在让德国永远臣服, 有可能导致一场世界冲突的“欧洲内战”。此论在大洋两岸引起巨大反响, 也使凯恩斯博得大名, 更为以后的实践所证实。

在 1929—1933 年的大危机期间, 凯恩斯是英国内阁财政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他担任了英格兰银行董事。1944 年他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布雷顿森林城召开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 为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因而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开发银行的英国董事, 并在 1946 年当选为第一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凯恩斯的主要贡献在货币金融和商业周期理论方面, 1923 年他出版了《货币改革论》, 1930 年出版了《货币论》上下卷, 1936 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 亦称凯恩斯的货币三论, 形成了凯恩斯经济学说的三部曲。虽然其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前后差异和变化很大, 但却有着前后继承的关系, 从中既可以看出其思想演变的线索和脉络, 也可以了解凯恩斯治学的特点, 说明了他的经济理论思想是紧密联系实际并不断发展的。货币三论也是哈耶克批判的主要对象, 形成了经济学发展史上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理论论战。特别是《通论》的出版曾经引起一场经济学的革命, 史称“凯恩斯革命”, 不仅形成了总量分析的方法和方法论, 创立了宏观经济学, 而且主导了战后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方向。尽管凯恩斯在《通论》中写道,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 其力量之大, 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 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 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2]。但是, 由于他突发心脏病于 1946 年 4 月 21 日在索克塞斯家中逝世, 并没有看到他的经济学思想在上个世纪 50—60 年代统治世界的情形, 更不可能知道它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复归。

(二) 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1899—1992)

1899 年 5 月 8 日, 哈耶克出生在维也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其父曾在政府的福利系统担任医生, 并有植物学的论文发表。1921 年, 哈耶克获得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1923 年又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并对心理学和经济学有很大的兴趣。特别是受米塞斯的影响, 他放弃了前期的费边社会主义思想, 走上了自由主义道路, 成为古典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和杰出代表。

1920年代,哈耶克在米塞斯的支持下创办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中心,并出任所长,1929年出版了第一本著作《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1931年出版了《价格与生产》,奠定了他在货币理论和周期理论方面的地位。1931年,哈耶克接受罗宾斯的邀请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开始了与凯恩斯的论战。在奥地利被纳粹占领后,哈耶克放弃了奥地利国籍,成为英国公民。

上世纪20、30年代,米塞斯发动了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辩论,哈耶克和米塞斯与奥斯卡·兰格和阿巴·勒纳的“市场社会主义”对阵,成为反方的代表。1944年,他发展了辩论中的思想,出版了堪称“世纪之作”的《通向奴役之路》,明确指出,主张用计划经济取代自由市场的人,不管多么用心良苦,都等于踏上了一条通往暴政的道路。因为,“市场的自由活动所受的阻碍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程度,计划者就被迫将管制范围加以扩展,直到它变得无所不包为止”^[3]。该书出版后,一方面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英美十分畅销,他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乃至全世界中最坚定地捍卫古典自由主义的人了”。另一方面,却受到左派人士的批判和经济学家的冷遇,被看作是经济学的“外行人”^[4],甚至芝加哥大学不愿聘他为经济学教授。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证实了哈耶克在书中的预言,1974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在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上的开创性研究,以及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相互关系上的透彻分析”。

从出版《通向奴役之路》开始,哈耶克也改变或者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更多地关注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问题,出版了《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和自由》三部曲,成为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与凯恩斯一样,哈耶克也相信思想和观念的力量,他在《通向奴役之路》的第一章中写道,“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使世界形成现在的状况(或译为: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5]。但与凯恩斯不同,他健康地活到93岁,比凯恩斯小16岁而长寿30年。生前他的思想不仅成为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执政的基本理念,而且亲眼看到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计划经济的破产。1992年3月23日在德国弗赖堡逝世。

二、理论贡献

(一)凯恩斯的贡献

凯恩斯著述颇丰,英国皇家经济学会曾将其全部作品编辑成《凯恩斯选集》,共30卷,而货币三论则是其主要的专业学术著作。凯恩斯的理论贡献也集中体现在这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不仅开始走向衰落,而且陷入了长达十多年的经济衰退,史称“英国病”。如果把“英国病”分为早、中、晚三期,货币三论就是对三个时期英国和世界经济现实问题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

1.《货币改革论》

《货币改革论》基本上传统古典经济学及其货币数量论。针对战后初期英国经济处于慢性萧条的困境,政府实行的是通货紧缩政策,同时决定恢复金本位,回到战前金平价。凯恩斯明确反对,他主张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辅之以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的温和调节,实行温和的通货膨胀政策,来稳定物价,克服萧条,恢复经济的均衡和繁荣,同时主张实行管理本位的货币制度。在《货币改革论》中,凯恩斯仍然相信新古典学派关于“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因而“储蓄=投资”的论点,而关于储蓄和投资的关系问题只是在序言中简要地提到,正文中并没有讨论,但却成为《货币论》考察的中心内容。

2.《货币论》

《货币论》对货币数量论加以修正,增加了一些被忽视的因素,扩展为“货币价值的基本公式”^[6],把利率和现金余额数量与各种价格水平,特别是总产品价格水平和消费品价格水平的决定联系起来,集中讨论了物价水平稳定和经济均衡实现的三个条件。

首先,作者把一般经济学中的利润范畴分为企业家的正常报酬和“利润”两个部分,把正常报酬当作生产费用和收入的一部分,“利润”是生产费用与销售收入之差,称为“意外利润”。“意外利润”的有无大小决定和反映了经济运行的状况。因此,当产品价格等于生产费用,“意外利润”为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

其次,《货币论》考察了储蓄和投资的关系,认为储蓄和投资的背离与矛盾是经济波动的原因,也是“英国病”的病根。因此,储蓄=投资是物价稳定和经济均衡的第二个条件。据此,凯恩斯主张,通过中央银行的利息率调节,可以达到储蓄=投资,实现经济均衡。

再次,依据维克赛尔的利率理论,自然利率能够使储蓄和投资的价值相等,而市场利率围绕着自然利率的波动,使储蓄和投资不能相等,“意外利润”就是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之间的差额。因此,只要中央银行调节市场利率,使其与自然利率保持一致,就可以使价格等于生产费用,储蓄=投资,“意外利润”为零,就可以保持物价稳定,实现经济均衡。所以市场利率=自然利率就成为经济均衡的第三个条件。

从以上的简述可以看出,《货币论》考察的中心是,如何维持物价稳定和经济均衡,如何实现储蓄和投资相等,如何使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相一致。其政策建议是政府要对银行体系的货币金融进行管理,要通过利率变动和利率调节去影响投资率,使储蓄与投资相等,从而达到价格稳定和经济均衡。

3.《通论》

《通论》对《货币论》既有继承,也有发展,是凯恩斯理论的集大成。

首先,凯恩斯放弃了萨伊关于供给自动创造它的需求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不是充分就业均衡,而是小于充分就业均衡,从而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概念,奠定了《通论》分析的基础。

其次,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

求,社会就业量就是由这种均衡状态决定的。由于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动,所以,就业量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这就从长期分析和供给分析转向短期分析和需求分析,确立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方法和方法论。

再次,由于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有效需求不足既可能是消费需求不足,也可能是投资需求不足,还可能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都不足,甚至是二者之和不足。凯恩斯把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归之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的作用^[7]。“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使消费增长赶不上收入增长,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心理上的灵活偏好”和“心理上对未来资产收益之预期”使预期的利润率有偏低趋势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就会引起投资需求不足。“心理上对未来资产收益之预期”,即资本边际效率特别重要,“一个典型的(常常是普通的)恐慌,其起因往往不是利率上涨,而是资本之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8]。在这里,凯恩斯不仅揭示了经济波动的原因,而且为预期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复次,在《通论》中,凯恩斯提出了“乘数理论”或“加速数原理”,论证了投资量的变动带来的国民收入变动要大于它本身的变动。

最后,《通论》的政策结论非常明显,经济过度繁荣是由于人类的“动物精神”,通过投资的乘数效应和加速数而形成,而萧条的出现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跌入“流动性陷阱”。这时,市场机制失灵,经济不可能自动纠正衰退和恢复均衡,需要进行政府干预,国家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多地“负起直接投资之责”^[9],并使用“改变租税体系、限定利率、以及其他方法,指导消费倾向”^[10]。这样就可以增加有效需求,走出经济萧条,维持经济繁荣。

(二)哈耶克的贡献

哈耶克笔耕不辍,相当高产,且在世时间多于凯恩斯 30 年,其研究写作的时间比凯恩斯多一倍,因而著述更多。概括起来,哈耶克的理论贡献分为两个阶段和两大方面。前期偏重于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后期则集中于社会理论。且前后的哲学基础和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1. 商业周期理论

哈耶克对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的贡献集中于《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1929 年出版德文版,1933 年出版英文版)和《价格与生产》(1931 年出版)两部著作中。前者主要分析周期波动的货币原因,后者主要考察构成经济真实波动的生产结构的变化,被哈氏看作是对其商业周期理论的一个根本性补充,但却体现了哈氏周期理论的特征。

哈耶克认为,货币信用扩张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因素。他依据维克赛尔的货币利率理论,主张保持货币中性,认为实际利率等于自然利率,即为中性货币,是市场经济自动均衡和价格稳定的基本条件。如果市场利率变动低于自然利率,就会引起货币增发和信用膨胀,从而导致危机发生。在《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中,他明确指出:“通过强行信贷扩张的方法而与萧条作斗争,就是试图通过采取

恰恰导致一场恶果的同样手段来祛除恶果。因为我们正在蒙受着错误定向生产之苦,我们就想进一步制造这种错误……这样一种程序,一旦信贷扩张停止,必将导致更为严重的危机”^[11]。

哈耶克不仅说明了货币信用扩张是经济危机的原因,而且揭示了信用扩张如何扭曲生产结构,导致危机形成的过程和机理。他依据门格爾的财货理论和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理论,构建了“哈耶克三角”模型^[12]:三角形的一个直边代表生产结构的时间维度,即生产的迂回程度,另一个直边代表生产阶段,而每个阶段的垂直高度代表尚待完成的生产过程的货币价值,而斜边则代表整个生产过程产出最终消费品的货币价值。据此,生产越迂回,生产最终消费品所需要的中间产品生产阶段越多,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也需要更多的货币。

哈耶克认为,在一个不为政府和央行货币政策扰动的市场经济中,人们对当下消费和未来消费的时间偏好的变动就会引起利率的变动,这种利率变动就会造成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进而带来资源配置的变化和生产结构的调整。这种变动过程就像一把扇子一样,会自然地不断打开、闭合或折叠,调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而不会造成“工业波动”和“商业周期”。

这样一来,哈耶克就把消费者时际偏好引起的利率变化,与政府主导的信用扩张和央行操控的利率变动严格区分开来,进而揭示了危机发生的根源。央行扩大货币供给而人为地压低利率,在短期内扩大就业和增加产出的同时,也会带来相对价格的变化,使得原来亏损的项目变得有利可图,导致资源过多地错配在生产高阶资本品的项目上。先是造成资本品价格和生产资本品工人工资的上涨,投资品过剩,继而增加消费品的需求和减少储蓄。而消费品需求的增加又会导致其价格上涨和供给的不足。一旦不当投资的企业产品滞销,经营亏损,无法偿付银行贷款,整个金融系统和生产过程就会突然断裂,经济危机就会到来。他说,“生产设施过量扩张的过程一旦被开启,除非经由一场以失业和消费需求下降为特征的危机,从而释放出起码能使已经扩大的生产设施完工所部分需要的资源,否则是不可能完成的”^[13]。

基于此,哈耶克的结论是相信市场自动调节的能力,反对政府的人为干预,既不赞同政府扩大投资以增加就业,也反对央行扩张信用,以救治萧条。

2. 自由社会理论

哈耶克在重述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地探索和创造,建立了博大精深而又自成一体的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体系。其大致框架包括:个人主义的自由观,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观,正当行为的规则观,文化和道德进化的法治观,否定性的正义观和无知的知识观。

哈耶克认为,所谓自由是指个人的自由,而不是集体或组织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指对个人强制的免除,是对个人私域的界定和保护,它作为一种目的本身,构成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同时也是为人们提供助益的手段。他明确指出,“个人在性质上乃是社会的”,既反对“伪个人主义”,也批判集体主义,它们的共同特点

在于忽视了个人或个人行动所具有的社会特性^[14]。

哈耶克所钟情和倡导的社会秩序是自由秩序,也就是他所发现的自生自发的秩序。他把所有社会秩序分为自生自发的秩序和组织秩序或“人造的秩序”两类,认为前者是人之行动的非意图的结果,而非人之设计之结果,而后者则是人们人为设计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前者为不同的个人实现其各自的目的提供了有助益的条件,后者往往使个人成为实现某个前定具体目的的工具^[15]。

哈耶克所说的规则是一般性的抽象规则,他所谓的自由是规则下的自由,所谓秩序也是规则遵从的秩序。他说,“有一项原则能够继续自由社会,这项原则就是严格阻止一切强制性权力的适用,除非实施平等适用于人人的一般性的抽象的规则需要者外”^[16]。为此他把规则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前者是社会在长期的文化进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后者是根据组织者和治理者的意志制定的。尽管外部规则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治理工具,但不能因此而取代和侵扰内部规则。

哈耶克的法律与一般人通常理解的由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不同,“只能是那种抽象且一般意义上的规则”,经由立法机构制定的是“给予当局以权力”的命令。哈氏眼中的法治就是政府除非实行众所周知的规则外,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它构成了对政府机构(包括立法机构)一切权力的限制。法律的“工具性”在于,当人们遵守法律时,是在追求自己的目的,是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因此,“只有在自由主义时代,法治才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并且是自由主义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由在法律上的表现”^[17]。可见哈耶克的法是法治之法,哈耶克的治是自由之治。

哈耶克区分了正义和“社会正义”,认为“社会正义”的核心诉求是,正义地或更为公平地分配物品。为此,必须对“社会”做出人格化的设定,“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拥有意识心智并能够在行动中受道德原则指导的主体”,这种社会与自生自发的发展起来的人际关系秩序没有任何关系。通过对“社会正义”论者“社会观”和“正义观”的批判,哈氏确立了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它不仅是所有法律不可或缺的基础和限度,而且构成自由社会得以运转之基础的基本首先观念,是自由人交往不可或缺的条件。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正义观,它受正当行为规则的支配,不正义是真正的首要概念,正当行为规则的目的在于防阻不正义的行为^[18]。

哈耶克是从行动者的无知的角度主张自由的。他明确指出,“主张个人自由的依据,主要在于承认所有的人对于实现其目的及福利所赖以为基础的众多因素,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无知”^[19]。他把无知分为两种,一是可以克服的无知,即“一般的无知”;二是无从克服只能应对的无知,即“必然无知”。前者是指对特定事实的无知,后者是指在开始行动时,对其所遵循的社会行为规则是无知的,且不存在克服这种无知的手段,所以行动者只能应对和遵从,不能克服^[20]。

三、理论论战

《哈耶克传》^[21]《凯恩斯传》^[22]和《凯恩斯大战哈耶克》都记述了哈、凯二人

的经济理论论战,篇幅很大,我们根据需要,摘其要者而述之。

(一)论战的起因

剑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是英国的两大著名高等学府,马歇尔和凯恩斯在剑桥大学,名声显赫;威廉·贝弗里奇和莱昂内尔·罗宾斯在伦敦经济学院,相对逊色。1929年,罗宾斯受到贝弗里奇的提拔,取得了政治经济学的教职,成为“全英国最年轻的教授”。他雄心勃勃,要与剑桥一争高下,使伦敦经济学院成为英国的思想储蓄所,能够完整地展现欧洲思想。

与此同时,哈耶克在维也纳用德文发表了《储蓄“悖论”》一文,批评美国经济学家瓦蒂尔·卡斯钦和威廉·特鲁弗·福斯特的储蓄与需求存在直接联系的观点。后者与凯恩斯一样,认为经济衰退是因为储蓄太多,主张用公共项目拉动需求,走出衰退。罗宾斯读了《储蓄“悖论”》以后,认为哈耶克是能够与凯恩斯对阵的高手,于是1931年2月,他邀请哈耶克到伦敦经济学院做学术讲座。这时,哈耶克也想到英国发展,以便绕道伦敦实现他登上奥地利社会最高峰的计划。于是接受了罗宾斯的邀请,开始了与凯恩斯的论战。其实,哈耶克也非常明白自己受邀的原因,“(罗宾斯)盯上了我的主题,这是我们此刻需要用来跟凯恩斯对战的东西”^[23]。

(二)论战的根由

从前述关于二人理论贡献的简述中,我们已经看到凯恩斯和哈耶克经济理论的明显差异和尖锐对立,其论战就具有了不可避免的性质。因为,任何经济理论都有自己的社会思想理念和哲学基础,概括起来,无非是经济自由主义和经济干预主义。哈耶克和凯恩斯就是这两类经济理论及其思想理念和社会哲学的集中代表。哈耶克主张经济自由主义,把市场看作是自生自发秩序的范型,反对政府干预。而凯恩斯则主张政府干预主义,认为“我们不能把决定当前投资量之职责放在私人手中”^[24]。因此,二人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矛盾,不仅是关于经济危机的原因及其治理的办法,而且还关于经济计划的必要性,关于政府干预与暴政之间的关系等。事实上,二人都清楚彼此社会哲学立场和道德信念的不同。

(三)论战的经过

哈耶克接受罗宾斯的邀请,在马歇尔学会举办了四次讲座,开始了对凯恩斯的批评。第一讲“货币对价格影响的理论”,论述了货币、价格和生产之间的关系,确立了他与凯恩斯争论的核心,“货币量的任何变动——不管它对价格水平有无影响——无论何时必定会影响到相对价格。并且,毫无疑问,决定生产数量和生产方向的,乃是相对价格,因而几乎货币数量的任何变动也都必然要影响到生产”。因而,货币理论“将不再是一般的货币价值论,而是货币对各种货物之间不同的交换比例发生的影响的理论”^[25]。第二讲“消费品生产和生产产品生产达成均衡的条件”,他利用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理论,构造了“哈耶克三角”模型,讨论了提高生产的两种途径,一是正常储蓄,即人们自愿少消费多储蓄,投资于资本货物生产;二是“强迫储蓄”,即通过银行放贷增加资本品的投资,此举会引

起生产结构失衡。第三讲“价格机制在信贷周期中的运作”，论述了过度增加信贷，会导致资本货物生产混乱，用向消费者提供信贷来治愈萧条，会起到反作用，“如果要长期地‘动员’一切可用资源，唯一的办法并不是采用人为的刺激——无论在危机时期或危机以后——而是听任时间去完成一个持久性治疗，即使生产结构缓慢地适应于可以用作资本用途的资金的这一过程”^[26]。第四讲讨论了中性货币理论，认为保持货币中性是避免周期大幅波动和危机的正确途径。这里虽然批评了凯恩斯的观点，但没有点凯恩斯的名。这次讲座于1931年结集出版了《物价与生产》，1935年再版。在举办讲座的同时，《储蓄“悖论”》被译成英文，发表在罗宾斯负责编辑的《经济学刊》1931年5月号上。

哈耶克对凯恩斯的点名批评是为《货币论》写的长篇书评《对凯恩斯先生货币纯理论的思考》，第一部分发表在《经济学刊》1931年8月号上，第二部分发表在1932年2月号上。评论在概述了《货币论》的主要观点以后，首先指出，凯恩斯关于银行利率的一般理论，即通过货币供给的变动来影响价格和生产，根本解决不了银行利率与均衡利率是如何偏离的问题。因为银行利率的变动影响的首先是固定资本的价值，而不是投资；而储蓄和投资的非均衡是由于“有效流通的变化，而不是货币数量的变动，或者说仅仅在于流通速度的有效性”。哈耶克也反对凯恩斯的政策结论，“任何想通过信贷扩张来治愈危机的努力，不仅是把病症当病因来治，而且可能通过延迟必要的真正调整而延长萧条”，“非常不幸，与其他许多当代经济学家一样，凯恩斯先生的这些治标不治本的药方，却误导了大多数人的注意力……他忽略了更深层的‘现象’，使他不能对大萧条更深层原因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哈耶克不仅批评了凯恩斯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而且火药味十足，斥责凯恩斯智力不足，该书“艰深，无章可循，晦涩”，“显然只是表达了知识迅速发展的一個短暂过渡阶段。这个时代期待它的出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惜，不能不说它辜负了这种期待。”

凯恩斯在《经济学刊》11月号发表了回应文章《货币纯理论：回应哈耶克博士》，在承认《货币论》存在不足（该书序言已经述及）的同时，一方面捍卫自己的观点，认为自己的分析与哈耶克的观点不同，“照我看来，仅仅是由于人们会改变他们的储蓄率，或者企业家亦会改变他们的投资率，储蓄和投资（如我界定的那样）可以发生脱节，而没有在银行体系中改变‘货币中性’——如哈耶克博士界定的那样，因而，在经济体系内部并不存在一种自动机制使公众的储蓄率与企业家的投资率保持相等”，另一方面批评哈耶克的《物价与生产》，“在我读过的书里，这本书要算最糊涂的一本了。开篇前45页几乎没能提出一点合理的主张”，甚至说这是一本“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杂烩”。

随后，二人通过书信来往激烈交锋。从1931年12月10日到1932年3月29日，二人相互通了12封信，不仅对各自的观点进行解释和辩护，而且往往纠缠于彼此所用术语的含义。哈耶克书评的第二部分发表后，凯恩斯让斯拉法继续辩论，自己对“是否应当回到《经济学刊》的争论表示怀疑”，并在3月写信给哈

耶克,“我尝试重塑、改善我的中心立场,我想,打发时间的話,这恐怕是一种比争论更好的方式”^[27]。于是转移了自己的方向,开始构思《通论》和其他工作。1933年,哈耶克委托尼古拉斯·卡尔多和 H.M.克鲁姆把《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译成英文出版。由于凯恩斯有意解决现有资本理论的不足,哈耶克开始写作《资本的纯理论》予以回应,以抗衡凯恩斯的《通论》。

1936年2月4日,《通论》正式出版发行。一开篇凯恩斯就向传统经济学宣战,并在书中多次批评哈耶克,他驳斥了哈耶克对“强迫储蓄”的解释,质疑哈耶克“生产阶段”和“迂回生产”的有效性。《通论》的问世打响了“凯恩斯革命”的第一枪,不仅为赫伯特·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公共工程计划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而且震慑了美英想要解决大萧条的一代年轻经济学家。很多人都成了凯恩斯主义者,甚至罗宾斯后来也加入了凯恩斯的阵营。

在《通论》正式出版前,凯恩斯给哈耶克送去了预印本,邀请哈耶克进行批评,但哈耶克并未参战。对此,人们反复恳请哈耶克做出说明,哈氏也曾多次做过解释,往往难以令人信服。在纪念凯恩斯诞辰100周年时,他说,“对于我用了大量时间仔细分析他的作品之后却未能重返战场的原因,我应该解释一下——我为这件事责怪自己很多年了”^[28],与其说是其他原因,倒不如说是“凯恩斯罔顾我认为关键的问题使我意识到,恰当的批评要对付的不是他在讨论的事情,而是他不曾涉及的东西,故此,彻底对付凯恩斯论点的先决条件,是有一套精心阐述的资本理论,哪怕它的建构尚未成熟”^[29]。哈耶克当时正在写他的《资本纯理论》,在收到凯恩斯寄来《通论》的两个星期后,他告诉戈特弗里德·哈伯勒,“我努力专心写我的书,必须把其他一切搁置起来”,至于《通论》,“我暂时还没法发表意见,因为我自己的书绝望地卡在了第6章”^[30]。1936年11月10日,哈耶克在伦敦俱乐部发表就职演说《经济学与知识》,表明了他思考的新方向,且是这个方面的第一个成果。

哈耶克没有正面评论《通论》,但却不点名地批评了凯恩斯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增加就业的主张。他在1939年出版的《利润、利息和投资》一书中写道,“当然,从来没有人否定利用扩张货币的手段能迅速增加就业,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但必须加以说明的是,仅仅利用这种手段创造就业,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用这种手段创造就业,等于是让经济波动永无止境”,并强调指出,“利用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实现就业最大化的目标,在本质上是一种亡命徒式的政策,只有这类人才会在短期的喘息中毫无损失地获得一切”^[31]。

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哈耶克把书送给凯恩斯。二人围绕着经济计划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发生了争论。凯恩斯读后,虽然赞同哈耶克的道义立场和哲学观点,但不接受哈耶克的经济学论述,并对哈氏对计划的批评提出商榷。他说,“我应该说,我们想要的不是完全不计划,甚至减少计划,事实上,我应该说,我们几乎想要更多的计划。但计划需要在这样一个社会下进行,即有尽量多的人,无论是领导者还是追随者,都完全跟你有着一样的道德立场……只要执

行计划的人脑袋里、心灵里都有着正确的道德方向,适度的计划就很安全”^[32]。凯恩斯还说,“你时不时的承认,这是一个在哪里划下界限的问题。你赞同必须在某个地方划下界限,也赞成逻辑上的极端是不可取的。但你却并未向我们说明在哪里、怎么划下这条界限。诚然,你我划线的地方可能有所不同。我猜,照我的观点,你大大低估了中间路线的可行性。但你只要承认极端不可取,又必须划界限,你就反驳了自己的论点,因为此前你一直试图说服我们,只要朝着计划方向迈出一寸,你就必定走上滑坡的路,它会带我们跌下悬崖”^[33]。当凯恩斯认为在珍视自由的国家,比如英国,计划不会招来暴政。哈耶克反驳说,“我担心我的不少英国朋友们,比如凯恩斯,仍然相信,英国人现存的道德信念能保护他们免遭这样的命运,滑稽啊?”^[34]《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哈耶克彻底完成了他的理论转向。

二战后,美国出现了30年的经济繁荣,凯恩斯即成为英雄,凯恩斯主义也成为西方经济学新的正统。1965年12月,《时代》杂志把“年度人物”的荣誉颁给了凯恩斯,并称赞道,“华盛顿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人们,利用凯恩斯主义的原则,不光避免了战前岁月的暴力循环,还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和极其稳定的物价”。

然而,物极必反。到了1970年代,美国以及西方国家陷入了滞胀,经济学及其社会哲学摆向了自由主义一边,也使现实的经济政策发生了变化。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以哈耶克思想的追随者自诩,实行了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这就为哈耶克进一步批评凯恩斯带来了机遇。

1974年哈耶克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获奖演说中说,“过去30年,指导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理论”,“在根本上是虚假的”,滞胀“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推荐甚至敦促政府采取的政策所带来的”^[35]。

同年10月15日,哈耶克在《每日电讯报》发表《通向失业的通货膨胀道路》,明确指出,“我要十分抱歉地说,目前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其责任完全要由经济学家——或至少要由我的经济学家同行中那些信奉凯恩斯爵士的教诲的大多数人负责……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完全是凯恩斯爵士的经济学的后果,正是由于他的那些门徒的建议甚至鼓动,各国政府才不断增发货币而不断增加开支,而凯恩斯以前的任何一位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都能预见到,这种开支的规模是如此之大,肯定会引起我们正在经历的通货膨胀”。

1975年9月25日,在洛桑召开的“日内瓦黄金与货币”大会上,哈耶克进一步指出,“我们目前面临的货币困境的主要根源,当然在于凯恩斯爵士和他的门徒们对于下面古老的迷信赋予了科学的权威:通过增加货币支出的总量,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确保经济繁荣和充分就业”^[36]。不过,哈耶克还是把凯恩斯本人的经济理论与所谓“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区别开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过多地指责凯恩斯爵士,要他为身后的理论发展负责,这多少有点不公平。我确信,不管他以前说过什么,如若他还在人世,一定是位反对目前通货膨胀的

领袖”^[37]。

1976年,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中继续坚持,“货币政策与其说是萧条的救星,不如说是萧条的根源,因为货币管理当局很容易屈从于廉价货币的叫嚣,从而将生产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使后来的反弹成为不可避免,它不大可能协助经济摆脱在某一方向上过量投资的后果”^[38]。

四、亦敌亦友

论战归论战,批评归批评,哈耶克和凯恩斯的私人友谊不错,彼此的评价也相当高,虽然互相对彼此的经济学观点都不认同。二人的关系,真正是亦敌亦友。

1933年,凯恩斯在《通论》第一稿成书前写信给他的妻子,讲起他与哈耶克的交往及那时哈耶克的思想,“昨晚,我和他一起坐在大厅里,今天还跟他在皮耶罗·斯拉法家里吃了午饭。我们私交甚好。但他的理论是垃圾,我今天觉得,就连他自己也开始怀疑自己了”^[39]。很明显,最后一句是凯恩斯的误断。

战争把两个论敌“打”到了一起。二战中,英国政府通过公共借贷重整军备,凯恩斯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巨大的军备支出,再加上军队征募士兵,会把整个劳动力都用上,带动需求大规模提升。这不光会吃光用有限供给去打仗的政府,通货膨胀也将紧随其后。因为货币太多,而商品却太少。政府只能在高税收、通货膨胀或定量配给三种方式中做出选择,要不然,就是三者合一。并于1940年10月20日在马歇尔学会的《战争潜力和战争融资》中,公布了自己的计划。哈耶克评论道,凯恩斯有着“在世经济学家中最丰富的思想”,“凯恩斯先生的建议……似乎是唯一真正的解决方案”。“他与更‘正统’经济学家之间的长久分歧,已经消失了”,“战争期间,我站在凯恩斯一边,共同抵抗对他的批评,因为凯恩斯非常反对通货膨胀”^[40]。

德国轰炸伦敦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搬到剑桥的彼得学院,凯恩斯为哈耶克在国王学院自己房子的附近找了个地方,二人经常碰面,一起巡逻,彼此答应做个好相处的熟人。哈耶克回忆说,“我们有好多其他的共同兴趣,历史方面的,除了经济学之外的。基本上,我们见面后不谈经济学……所以,在私交上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包括莉迪亚·洛普科娃”^[41]。

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哈耶克寄书给凯恩斯。凯恩斯在去美国的轮船上读后回复说,“在我看来,这是一本伟大的作品。我们有绝对充分的理由感谢你把迫切应该说出来的话说得这么好。想必你知道,我并不完全接受这本书里的经济学论述。但从道义上和哲学上,我几乎完全同意它的观点;我不光同意,而且深为感动”。

1946年凯恩斯逝世,哈耶克写信给莉迪亚,称赞凯恩斯是“我所认识的真正伟人,令我无限仰慕。没有他,世界会是一个远为贫困的地方”^[42]。

在上世纪50、60年代,哈耶克还说,凯恩斯“是那一代人里最有影响力、思想

最丰富多彩的人物”，“对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3]，“评价凯恩斯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如此多面，哪怕你认为他的经济学既错误，又危险……所有知道他的人仍会将之视之为伟人”^[44]。

1983年，英国《经济学家》邀请哈耶克为凯恩斯百年寿诞写纪念文章，哈耶克写道，“凯恩斯也许是我一生中遇到过的给人印象最深的思想家，我也曾渐渐认识到他在一般思想领域的卓越之处，但是，让他暴得大名的那些科学研究成果，却完全是错误的”。

五、和而不同

韦森在《哈耶克逝世20周年纪念专论》之七、之八两篇文章中，对哈耶克和凯恩斯的理论渊源及其发展做了一些探索，使我们对二人分歧的由来及其论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值得一读。

哈耶克和凯恩斯的理论同源，都来自维克赛尔的“货币均衡论”。然而，维克赛尔的“货币均衡论”比较含混，也比较抽象。他一方面把自然利率解释为假设没有货币时实物资本的借贷利率，另一方面又把这个自然利率理解为投资与储蓄相等时的均衡利率。对于其中的不足，哈耶克和凯恩斯都认识到了。在写作《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时，哈耶克放弃了维克赛尔自然利率的第一重含义，只从投资和储蓄相等时的均衡利率来理解“自然利率”。凯恩斯在写作《货币论》时，做了同样的处理，完全是从“自然利率”的第二重含义来讨论问题，前述凯恩斯在该书中论述经济均衡的三个条件就是证明。但二人均未认识到，“自然利率”的第二重含义只是纯粹抽象的理论假设，在经济现实中不能确定何时投资等于储蓄，货币均衡论的思想不能应用于实际，他们同样是进行纯理论的逻辑推理，无法解释经济现实。

经过与哈耶克的论战，凯恩斯在创作《通论》时，修正了《货币论》的观点，一方面抛弃了维克赛尔的“自然利率”概念，明确指出，在《货币论》中，“所谓自然利率，乃是使一时期中储蓄量与投资量保持相等之利率。当时我认为这是唯一的利率”，“我当初觉得‘自然’利率这一概念非常有前途；我现在不再这么想，反之，我觉得这个概念对于我们的分析没有多大用处，也没有多大重要性”^[45]。另一方面，他又沿着维克赛尔货币均衡论的思路，把自然利率的第一重含义改造成“资本的边际效率”，后演变成“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进而创造性地提出了“边际消费倾向”和“有效需求”概念，构建了他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明确指出，“我认为商业循环之主要原因，还是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循环性变动”，“一个典型的（往往是最普通的）恐慌，其起因往往不是利率上涨，而是资本之边际效率突然崩溃”，“决定资本之边际效率者乃是不受控制，无法管理的市场心理。用平常话说来，在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信任心最难操纵，最不易恢复”^[46]。

与凯恩斯一样，哈耶克在《利润、利息和投资》中，也抛弃了维克赛尔“自然利率”的概念，使用了“利润率”或“边际利润率”来讨论信贷、投资和商业周期问题。

韦森明确指出,“现在看来,哈耶克这时所使用的‘利润率’或‘边际利润率’,与凯恩斯所用的‘资本边际效率’大致是指一回事,且分析思路也大致相同”。但仍然“坚持之前在《价格与生产》等著作中所扩展出来的货币供给和利率变动对社会生产结构之影响的研究思路”^[47]。这样一来,哈耶克仍然坚持了《价格与生产》中经济危机和商业周期的观点,而与《通论》中提出的经济周期理论区别开来。

经过上述一番梳理和论述,我们可以对哈耶克和凯恩斯的和而不同和理论论战做出进一步的概括和具体分析。

一是总量和结构。凯恩斯的分析方法是总量分析,讨论的是一般价格水平,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的变动。而哈耶克的分析方法是结构分析,《价格与生产》一书就是通过利率和货币量的变动对相对价格而不是一般价格水平的影响,导致生产结构的变化来分析经济运行的。哈耶克认为,“如果货币理论仍然试图在种种总量之间或总平均数之间建立因果关系,这就表明货币理论落后于一般经济学的发展。事实上,无论各种总量之间或各种平均数之间都不能相互起作用,亦不可能在它们之间建立必然的因果关系。……按照经济理论的本质来看,平均数根本不能构成理论推理的一个环节”^[48]。

二是短期和长期。凯恩斯的分析是短期分析,所考察的周期也是短周期,甚至主要是从繁荣到萧条,或者从萧条到繁荣,至于此后的影响,并不在他的考察之列,他的名言是“讲长期是对处理当前事务的误导。在长期,我们都死了”^[49]。而哈耶克的结构分析是长期分析,因为生产结构的变化,不是短期内可以显现出来和观察得到的,但对于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又具有根本性的性质。像“英国病”和“日本病”这样长达十年或数十年的萧条,凯恩斯的理论是解释不了的,而哈耶克的分析却有其解释能力。

三是供给和需求。凯恩斯的分析是需求分析,《通论》是以有效需求为基础和中心开展的,三大心理规律和预期都是为了说明需求的变动;供给分析是凯恩斯主义者后来加上去的。而哈耶克的生产结构分析是供给分析,依据的是“迂回生产”理论,讨论的是实际产出的变化。从有效需求不足出发,结论自然是扩张货币和信贷,增加需求,从相对价格调整导致生产结构变化,自然要坚持市场过程的作用。

四是政府和市场。凯恩斯既不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论者,也不是自由市场论者,他立足于市场和市场经济,但又不完全相信市场和市场经济,他认为危机是企业家追求利润的“动物精神”造成的,且短期内市场信心难以恢复,因而需要政府干预和政府救治,但他忽视了政府自我扩张的本性,一旦政府强行干预,不仅有可能造成更大的灾难,而且还会制造新的干预。哈耶克是坚定的自由市场论者,对政府行为总是保持着高度警惕,他说,“在我自己漫长的一生中,我对政府的看法越来越糟:政府越是想采取某些明智的行动(而不是简单地遵从现成的规则),它造成的危害就越多——因为,一旦被人们知道政府要达到某个特定的目标而行事(而不是仅仅维持一个自我调适的自发秩序),就不能免于为某些

党派的利益服务了”^[50]。他认为,危机是政府干预造成的,市场是企业家生存和活动的天地,企业家精神是人类社会的推动力,市场完全能够避免和救治危机。

五是理性狂妄和理性不足、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凯恩斯确有点理性万能和理性狂妄,也充满着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他不仅相信自己的理论,而且相信自己的能力。1935年元旦,他写信给萧伯纳,“我相信自己正在写的这本经济理论书,在很大程度上,对世界如何思考经济问题具有革命意义——我猜,不是马上,但在未来10年里必定会体现出来”,“我并不指望你,或者其他任何人,在现阶段相信这一点。但对我而言,我不仅仅希望自己所说的成真,而且我暗地里十分有把握”^[51]。据哈耶克回忆,1946年1月,凯恩斯“宽慰地对我解释说,他提出那些观点的时候,时代正迫切需要之。他暗示我不必惊慌:如果它们变得危险,他会迅速掉转公共舆论的”,“他相信自己可以把舆论当成工具般摆弄”^[52]。哈耶克反复强调理性不足,批评理性狂妄,强调人的无知和规则遵从,他重视人们的经验,主张从经验中学习,他在重述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同时,也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他相信自己的理论,但并没有凯恩斯那么理想和乐观,而是具有经验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色彩。这也是他们社会理念和哲学立场差异的表现。

六、一点反思

哈耶克和凯恩斯论战了半个世纪,其中心是关于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问题。我们想就此做一点反思性的评论和小结。

从1930年代的大危机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欧债危机,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的衰退和危机,但能否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还不一定。2009年,笔者在《国际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学的挑战——从现实经济运行中提出的问题》一文中,提出如下的理论观点似乎值得思考。“第一,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社会制度的性质,而在于人类的局限。在未来不确定的情况下,人类要不断地前进和创新,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不同的制度条件对于危机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第二,危机的形成既是市场失效的结果,也是政府失效的产物。只是二者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罢了。即‘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反危机中,政府有其特殊的优势,但并非万能。正确设计和运用反危机的政策,才能将其对资源再配置和创新过程以及市场制度的副作用降至最低。第三,人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有条件的,是指人们能够从失败中学习,切肤之痛使很多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成功乃失败之母,这往往是无条件的,因为人性的局限,使得人们总是生活在自己的成功之中,忘记和忽略了随之而来的危险。危机是过度繁荣的必然结果,对于繁荣程度的认识从来都是不一致的,准确把握就更难,往往是不碰南墙不回头。这既是事出必然,也是进一步探索的推动力”^[53]。

总之,危机是人类的一种纠错机制。

注释:

[1] Keynes, J.M.,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Harcourt, Brace & Howe, New York, 1920.

[2][7][8][9][10][24][45][46][英]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徐毓桐译, 商务印书馆, 1983年, 第330, 209, 273, 140, 325, 276, 206, 207, 271, 273, 274页。

[3][5][17][英] 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王明毅、冯兴元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 第103, 19, 82页。

[4] 哈耶克晚年在接受采访时说, “在我写出《通往奴役之路》后, 这本书是如此不受欢迎, 以至于大多数同行经济学家都不信任我了。结果, 不仅我的理论影响下降了, 许多大学的经济系也不欢迎我了, 一直到现在我都能感到这一点。很多经济学家倾向于把我看成一个(行)外人, 认为竟然有人写出像《通往奴役之路》这样完全属于政治学的书。”

[6][英]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货币论》(上卷), 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113—115页。

[11] Hayek, F.A., *Monetary Theory and the Business Cycle*. London: Jonathon Cape, 1933.

[12][25][26][48][英] 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物价与生产》, 滕维藻、朱宗凤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 第38, 30, 31, 80, 13页。

[13] Hayek, F.A., (1929/1931), *The “paradox” of Saving*, published in *Economica*, vol.11, May 1931.

[14][英] 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邓正来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

[15][20][英] 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邓正来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

[16][英] 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册), 邓正来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 第43页。

[18][英] 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 《社会正义的幻象》, 邓正来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年。

[19][英] 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邓正来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 第28页。

[21][美] 艾伯斯坦:《哈耶克传》, 秋风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22][英] 哈罗德:《凯恩斯传》, 刘精得译, 商务印书馆, 1997年。

[23] Hayek, F.A., *Hayek on Hayek*, ed. Stephen Kresge and Leif Wena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44.

[27] *Collected Works*, vol.9: *Contra Keynes and Cambridge*, p.173; 转引自[美] 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 阎佳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年, 第112—113页。

[28] Hayek, F.A., “The Keynes Centenary: the Austrian”, *Economist*, June 11, 1983, pp.45—48, reproduced in *Collected Works*, vol.9: *Contra Keynes and Cambridge*, p.247; 转引自[美] 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 阎佳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年, 第142页。

[29] *Collected Works*, vol.9: *Contra Keynes and Cambridge*, p.241; 转引自[美] 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 阎佳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年, 第142页。

[30] Letter from Hayek to Haberler, March 15, 1936, Haberler Papers, Box 67; 转引自[美] 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 阎佳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年, 第143页。

[31] Hayek, F.A., *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 and other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Fluctuations*, Clifton, NJ: Augustus M. Kelley Publishers, 1939.

[32] *Collected Writings*, vol.17: *Activities 1920—2*, pp.385—387; 转引自[美] 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 阎佳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年, 第161—162页。

[33][34] *Collected Writings*, vol.17: *Activities 1920—2*, pp.385—387; 转引自[美] 尼古拉斯·韦普肖特

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阎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163页。

[35][37] Hayek, F. A.,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36][英]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货币选择:终结通货膨胀之道》,《货币的非国家化》,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69页。

[38][英]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秋凤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16页。

[39] Letter from Keynes to Lydia, March 5, 1933, quoted in *ibid*; 转引自[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阎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101页。

[40] Hayek, F. A., "Mr Keynes and War Costs", *Spectator*, November 24, 1939, in *Collected Works*, vol.10: *Socialism and War*, pp.167—168; 转引自[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阎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156页。

[41] Hayek, F. A., *Hayek on Hayek*, p.91; 转引自[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阎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157页。

[42] Quoted in Ebenstein, Friedrich Hayek, p.344; 转引自[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阎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168页。

[43] Hayek, F. A., "Review of Harrod's Life of J.M.Keyne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24, no. 2, June 1952, pp.195—198; 转引自[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阎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246页。

[44] Hayek, F. A., "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Keynes and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Oriental Economist*, vol.34, no.663, January 1966, pp.78—80; 转引自[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阎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246页。

[47][50] 韦森:《重读哈耶克》,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31、99页。

[49] Keynes, J. M.,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1924/2000, p. 80.

[51] *Collected Writings*, vol.13: *General Theory and After*, Part1, p.492; 转引自[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阎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118页。

[52] *Collected Works*, vol.9: *Contra Keynes and Cambridge*, p.232; 转引自[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阎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167页。

[53] 张曙光:《中国问题的经济学》,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72页。

[责任编辑:马立钊]